

饶宗颐国学研究方法论

邵友伟 郑炜明

摘 要：饶宗颐与其一以贯之的国学的方法论是分不开的。通过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自己多年学术实践的总结，饶先生在方法论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他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他通过文化互鉴的方法来论证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印度文化、古巴比伦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相同点和联系。其方法论还包含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即用目录学的方法来串联材料；用训诂学的方法来对古文字在字形、字音、字义等加以考证。

关键词：饶宗颐 五重证据法 古史重建 文化互鉴

一、从三重证据法到五重证据法

自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发现以来，古史研究的视野即得到了开拓，最早将地下出土材料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是王国维先生。王氏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肯定了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相互印证作用。饶宗颐在“从郭店楚简追踪古哲之‘重言’——儒、道学脉试论”一文中提到对待文化的态度是接着讲，在接着讲这一前提下又提出照着讲和参着讲。从这一意义上看，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对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接着讲的。饶宗颐继承了王氏的二重证据法，并对其丰富和完善，扩展到三重证据法乃至后来的五重证据法。饶宗颐本人也亲口表达了对王氏的二重史料的继承。他说：“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文物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

更高，尤强调它的重要性。”^①王氏所说的纸上材料一般指传世的文献很少有异议，而饶宗颐则将王氏所说的地下新材料分为了经考古学田野发掘出土/调查所得的实物和带有铭刻文字的实物如甲骨、金文、竹木简、碑记等材料。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中肯定了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他说：“这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②李氏所说的古文字资料较好的概括了饶先生所涉猎的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内容。除了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王煦华先生认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学研究也运用了三重证据法。“所以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③与饶宗颐不同的是，顾氏并未用到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但其借鉴了一些民俗学资料。另外叶舒宪认为“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等借鉴西方人类学的方法的启示，也分别尝试第三重证据的运用”^④。因此，不同学科在方法论上的交互融合容易产生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除此一说之外，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还有不同的提法。饶宗颐在甲骨学研究中曾指出研究殷代史整理资料的三个方法途径：“一曰经传子史之疏通，二曰甲骨资料之搜采参证，三曰考证杂记之钩索。”^⑤这是饶宗颐对于三重证据法的早期设想，包含了饶宗颐对传统的研究方法的总结和提炼以及对王氏二重证据法的继承。相比于王氏的二重证据法，饶宗颐将经史子集代指纸上材料，将甲骨文代指地下材料，同时将对资料的分析也作为一重资料。饶宗颐与王氏作为甲骨学研究的

①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③ 王煦华：“前言”，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5页。

④ 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第4期。

⑤ 饶宗颐：“《商殷帝王本纪》序”，《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下”，第1062—1065页。

重要学者，都意识到甲骨学研究的重要性，王氏虽未明确阐述地下新材料为甲骨文，但其所生活的年代对新材料的界定一般指甲骨学和金石学。而饶宗颐因其在甲骨学领域深耕多年，亦非常重视甲骨文材料的作用，把甲骨文作为“一重”证据。在谈到夏文化的研究时他又将三重证据法归结为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研究在其三重证据法中的重要性。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在其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曾宪通先生称赞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的精妙之处体现在“从甲骨文考察夏代的礼制、据卜辞研究商殷之地域、从牙璋分布印证《淮南子》所称之商人疆土”^①。

在三重证据法之后，饶宗颐又进一步提出了五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是对三重证据法的补充和完善。其中民族学史料一项，饶宗颐借鉴了杨向奎先生所补充的民族学对古史研究的补充作用。杨向奎先生说：“鉴于中国各民族间社会发展之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证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②其实饶宗颐在很多研究中也运用了很多民族学的资料，如其在区域地理研究中就对民族学的史料广泛使用。在楚文化研究中借鉴了很多苗族的风俗和信仰，在吴越文化研究中联系了南越各少数民族与越族的关系，在西南文化研究中更是运用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的文献。叶舒宪从杨向奎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加入了比较图像材料作为第四重证据。^③饶宗颐所提的五重证据法除了民族学的资料还包含异邦的古史资料，如“中、外史诗上天地开辟与造人神话之初步比较——近东开辟史诗前言”一文就用古巴比伦、古希腊、腓尼基等族的古代神话与汉族神话进行对比研究。“古史上的天文与乐律关系之探讨——

① 曾宪通：“选堂先生三重证据法浅析”，《华学》第9、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37页。

②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序言”第1页。

③ 参见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第4期。

曾侯乙钟律与巴比伦天文学无关涉论”一文通过对巴比伦天文学的深度解析证明中国古代的乐律与此并没有关系。饶宗颐因着对印度学、梵学、悉昙学的研究，与中国古史多有比较。如西亚与中国都有𐎶这一字形，在西亚是女神肩上的符号代表着吉祥，而在甲骨文中一般认为是巫字。虽说饶宗颐对三重证据法进行丰富到五重证据法，但饶宗颐也指出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仅可作为间接的辅佐材料，是无法取代直接证据的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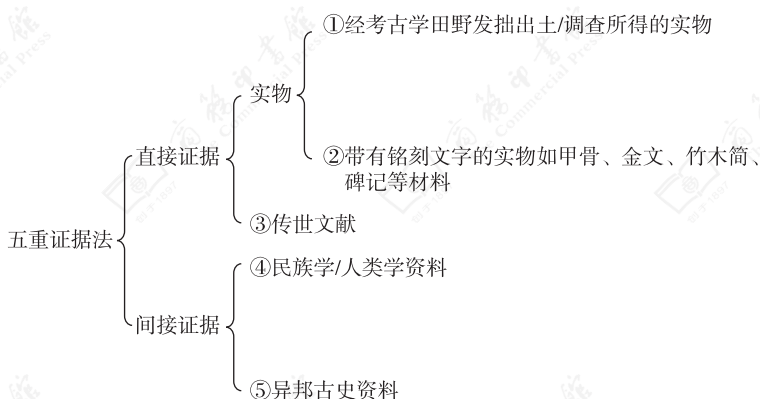


图4-1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除了应用于甲骨学研究以外，在古史地理学和古代神话研究领域也多有运用。除了经典材料以外，另外四种在古史地理研究中都有涉及。如在荆楚文化研究中，通过很多出土文物（实物）来辅助论证，如通过平江县的墓葬发现带豆黄色釉的陶豆、陶尊形器、铜铲、铜熔块及铁镢，长沙黄土岭战国墓出土的朱绘人物车马漆奁来证明楚国手工业所达到的高度。在阐释楚国的宗教观念的时候多次引用《楚缢书》和《子思子》的内容，二者均为新出土的古代文献。在吴越文化研究中，不仅运用了考古学材料还运用了甲骨文、金文等材料来论证。在吴越文化的起源中，浙江吴兴丘城、皖北曹庄、皖南蒋公山来证实青莲岗文化的特征，用郑州二里冈

殷代发现的印纹硬陶证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用南京北阴阳营墓出土的玉和玛瑙等证实越地文化的繁荣。在“文献记载下的吴、越”一文中饶宗颐从字源学入手，选择直接证据—实物—甲骨、金文材料来证明，用铭文的𠩺来证吴，用甲骨文的𠩺来证戊，戊即越字。在西南文化研究中，采用的证据法则更加多元。在西南民族的国家 and 氏族中采用了很多民族学研究的资料。在对蜀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还运用了异邦古史资料即越南的古史资料证实蜀王子在蜀亡国后移居越南称安阳王一事，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越交往意义重大。

在古史神话研究当中饶宗颐也充分利用三重证据法乃至五重证据法。他在论证炎帝与蚩尤的混用的时候不仅引用传世文献如《史记》《大戴礼记》《国语》等，还引用了江陵王家台出土秦简《归藏》以及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相关内容。在考证有娥与不周两地名的时候，饶宗颐引用了出土文献《九店楚简》关于不周的记载。在太皞和少皞的传说中，对东方的鸟俗神话结合了一些考古发现，如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群鸟图案，龙山文化遗址亦出土了鸟首形鼎与鸟首连胫陶等。又通过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的《五星占》与《刑德》两篇与伏生《尚书大传》中关于太皞的记载作对比，证明三者有很强的相似性。其五帝异说观亦采用了很多出土文献，如长沙子弹库帛书青木、赤木、黄木、白木、黑木的提法，《云梦秦简》《孙子兵法》等，同时采用《华阳国志·蜀志》等民族学史料。

二、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方法

从五重证据法中的一环注重异邦古史资料出发，以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在此过程中，饶先生的研究视角不断开拓，由探讨异邦古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拓展到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古史地理研究不仅重视中国境内各地理单元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同时也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他说：“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

同地区的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①饶宗颐的中外比较研究主要包含中华文化与古印度、古巴比伦文化之间的异同与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从两种异质的文化的角度看,“文明互鉴是可以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次。所谓文明的无意义互鉴,核心便是指文明之间往来的最为原初性的形式”^②。中华文化与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的互鉴在很多方面是无意识的,而且可以追溯到原初形式的文字和符号。

(一) 古巴比伦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异同

饶宗颐通过对两国音律和天文学的来源、生成过程以及运转方式的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和音律方面虽与古巴比伦有一些相似性,但并未发现二者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二者的互鉴是无意识的,或许是在各自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的。

古巴比伦的音乐已经随着古巴比伦文明的覆灭而灰飞烟灭,只能从考古以及古希腊文化中发现点滴遗存。就考古遗存来看,20世纪的苏美尔文化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各种竖琴和弹琴师的图刻,同时还出土了长颈琴、笛等乐器。这些文物遗存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到2000年之间,这是巴比伦文化关于乐器最早的资料。我国考古发现的河姆渡骨笛距今约5000年,贾湖骨笛距今约6000年,因此也不存在受巴比伦影响的可能性。^③通过这些文物发现饶宗颐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巴比伦的音律与中国古代的音律有什么联系。

在古代农业社会历法关系着农业生产,在古巴伦和中国古代都非常重视历法。饶宗颐认为两国的历法虽然表面上有相似点,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由古巴比伦传入的。在历法方面,饶宗颐认为二者就有本质的不同,二者的历法都是从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发

① 饶宗颐:“发刊词”,《华学》第1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赵旭东:“文化的自主性与文明的互惠性——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互鉴的实践逻辑与中国观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③ 参见戴念祖“中国、希腊和巴比伦:古代东西方的乐律传播问题”,《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3期。

展而来。二者的不同点体现在古巴比伦的历法（巴比伦王朝时间公元前19—前16世纪）主要表现为春分固定在一月份，这与中国把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是不同的。巴比伦以太阳落后新月在西方初见为一个月的开始，与中国朔旦为一月的开始也有明显区别。巴比伦的历法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调整和完善才逐渐定型。古巴比伦对于处理闰月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化过程，一开始置闰方法并无系统的规定，可能国王的一个命令就能任意更改。^①后来置闰法由公元前五世纪的八年三闰变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十九年七闰。饶宗颐根据《春秋》记载发现中国古代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系统的运用十九年七闰法。但二者的这种历法的运行方式更像是一种巧合，是平行发展的，尚未有证据表明二者的相互影响。

（二）印度古代文明与中国古史的联系

饶宗颐认为印度古代文明与中国古史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的可能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印度河谷的文字符号与我国出土的陶文很多都相同，二是印度出土的肩斧和段斧可能受中国古代越族的影响，三是中印两国都对卐字符有广泛的运用。

1920年印度河谷陆续出土了大量古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符和文字。饶宗颐通过将印度河谷出土的文字与中国古代出土的陶文作比较，意外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相似性。一方面，饶宗颐通过对印度河谷文字的研究解决了中国的半坡、乐都、二里头出土的文字有很多陶符不能辨识的问题；另一方面，印度河谷出现的很多文字和印欧系统的语言结构完全相违背，给予学者联系该出土文字与中国的汉字的猜想。

饶宗颐认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例证是印度肩斧和段斧的分布，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越族文化辐射到印度的体现。与此相对，饶宗颐认为云南蚀花肉红髓珠可能是由印度河谷传入的。饶宗颐认为印度

^① 如出土的泥砖记载国王汉谟拉比下令“今年年成不好，下个月必须改为闰六月代替七月，原定七月二十五日应缴的赋税改在闰六月二十五日缴纳”，参见饶宗颐“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与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418页。

Rangpur出土的陶文与我国三处古代遗址出土的陶文都有一些相同的符号出现，他将其分成三组。第一组是与半坡陶文相同的符号有：丨、||、|、↑、↓、×、†、J、丰。第二组是与华侨新村出土的陶文相同的符号：↑、卩、×、7、6、山、X。第三组是与明刀背文相同的符号：↑、√、√、叫、口、X等符号。^①

卩字同样是体现了中印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相同点的。饶宗颐根据出土文物发现我国的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所发现的陶器即有卩、卩两种符号出现。无独有偶，饶宗颐也注意到了印度Susa出土的彩瓶上有卩字符，印度Harappa印章上也发现了这一符号。除了在青海的发现，在河南陕县出土的唐开成三年的墓与云南丽江摩些文字都出现卩字符。更进一步，饶宗颐还发现这一字符遍及亚洲、美洲等地区，并且认为卩、卩、卩、卩等符号可归类为一种符号。由此可见，卩不仅体现了中印文化的相同点和影响，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由文化的比较和互鉴可以看出饶先生的国际视野，以及在中外文化互鉴中凸显中国学术文化的特色。

三、古史重建的方向与构想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确实起到了打破束缚、直击本源的进步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复兴以及民族自信心的提升，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古史学研究方法与方向成为时代的共识。古史重建一直以来得到学者们的提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济先生就提出了“古史重建”的思路，“他的思想就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②。晁福林先生认为古史的重建，即是从科学的角度推动考古学的发展。^③可见推动考古学的发展是

① 参见饶宗颐“谈印度河谷图形文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313页。

② 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③ 晁福林：“论古史重构”，《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

古史研究的一个大方向。饶宗颐对于古史重建的方向和构想和方法论上以五重证据法为基础。重建的原则体现为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保留中华文化的特色，对于古史的研究他主张接着讲。

通过多年在古史学领域的耕耘和实践，饶宗颐对于五重证据法的展开以及古史重建的方向做出了构想和展望。

（一）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二）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作深入的探究。

（三）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堪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①

这段话是饶宗颐对三重证据法乃至五重证据法的丰富和细致表述。可见他是把深入研究出土文物和文字作为古史重建的方向的。饶宗颐认为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不必仅仅停留在有限的古书上来争论。他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停滞在几本古书、在纸上文献，翻筋斗式地去任意作先后的安排，来武断事物出现的层次；或者只赤手空拳打几套玄学式的历史学的猜拳游戏。”^②饶宗颐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其五重证据法，随着出土文物和出土的文字记录的增多，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会不断得到解决。同时，也可以用很多民族学的史料和域外文明进行旁证。而这些的目的就是用材料说话，避免一些武断的猜测和任意的结论。如果没有充分的材料来论证，很多古书和古史上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些出土文献“正要求我们须更审慎地、冷静地去借重它们以比勘古书上种种记录，归纳出

①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6页。

② 同上。

符合古书记载原意的合理解释，而寻绎出有规律的历史条理”^①。从对出土文献的重视上，可以看出饶宗颐的学术研究是沿着可证实的路线进行研究的。

饶宗颐认为考古学很好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古史中错误的结论，另一个是古史研究的扩展。考古学解决了很多困扰学界几千年的问题，如饶宗颐提到，很长一段时间古代只有龟卜没有筮卦，易卦是从龟的形体演变而来，五行思想到汉代才开始发生等^②，长久以来固化的观点随着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材料的出土不攻自破。他所发现的古史研究会让人看到耳目一新的材料从而扩充某一领域的例子有很多。如郭店楚简的出土，丰富了对儒、道两家在战国时期思想发展状况的研究。东南地区出土的关于鸟的器物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古史传说中的鸟俗神话。通过比照甲骨文的记载，对古鱼国的传说有一些证明。

除了研究方法以外，饶宗颐亦多次强调对于中华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古史研究方面。他认为当前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缺乏信心，反而对于西方文化情有独钟。关于其中的原因，他说：“中国文化自19世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卷起洋务运动的热潮，对自己旧文化的真义，完全失去了信心。”^③长期以来，我们在很多研究领域都是按着西方的标准，丢失了我们本身固有的标准体系。在古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所有新与旧之争，伪经、疑古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是走许多冤枉路”^④。的确，这些无谓的争论使得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信任感变得不再坚定。这些模棱两可的怀疑和似是而非的争论都不如拿证据说话来得实在。针对此，饶宗颐给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通过出土文献来拓展学术视野，另一条是花费工夫去重新整理古代文献。出土文献的不断挖掘既可以验证很多古书的真实性，一些

①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6页。

② 同上。

③ 饶宗颐：“从郭店竹简追古哲之重言——儒、道学脉试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三“简帛学”，第5页。

④ 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第6页。

逸籍的发现则可以拓展古史研究领域的新视野。随着出土文献的被发掘,这些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古籍的整理工作如同对古史进行重构,从而以一种全新的样貌呈现在世人眼前,才能更好地传承。他还把简帛的发现与西晋太康时期的汲冢遗书相类比,把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与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相比拟。

四、古典文献学的方法

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换句话说讲即传统小学的方法,即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训诂、辑佚等。杜泽逊先生将文献分为著、述、编、译四种方式。^①作为学贯中西,终其一生将所有精力都用在读书、写书的学者,饶先生对著、述、编、译四种方式游刃有余,从容周遍。其研究于诸传统方法都有所运用,特别是目录学和训诂学的方法。

(一) 目录学的研究方法

饶宗颐的古史研究之所以能够视野宏阔,考证细致周密,离不开他扎实的目录学知识。他认为“熟悉目录学可以使你的学问做得精密,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②。他的目录学研究一方面包含扎实的搜集资料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包括通过融合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问来达到“左右逢源”的目的。饶先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广泛搜集资料的例子有很多,如其弱冠时在中山大学通志馆工作时即收集了大量地方志文献,又如其甲骨文研究不仅收集国内的甲骨文材料,更是远涉日本、欧洲、美国等地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其“左右逢源”既体现在其对不同学科的精通以及借鉴,又体现在借鉴异域文明的成果加以对比研究。其借鉴体现在古史研究中融入了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以及运用了民族学史料。对异邦古史的借鉴体现在用古印度、巴比伦、越南等文献与我国的古史研究进行旁证。

①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41页。

② 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其目录学既包含研究某一问题穷尽一切材料，又包含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其穷尽一切材料在甲骨学、楚文化研究以及《全明词》的编写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如饶先生在楚文化研究当中，不局限于楚文化的历史地理研究，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将楚辞、楚地理、楚简、楚帛书等梳理出脉络，这充分体现了饶宗颐的目录学功底与学术视野。在甲骨学研究中，特别是编纂《通考》的过程中，饶宗颐不仅收集了国内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搜集了日本、欧洲、美国等地收藏的甲骨文材料。为了编纂《全明词》，饶宗颐足迹遍布内地、港台以及日、美等国，总共搜集1390词家的近两万首作品。单就台湾所存明人文集就有1600种，饶宗颐都悉数翻阅。日本的内阁文库和哈佛大学的明人文集也全被翻阅一遍。^①其分类整理的例子也有很多，最典型的是《甲骨文通考》对人物和事迹进行的分人分事的整理。其次，关于楚文化研究的著作《楚辞书录》是典型的目录学著作，该书考证了96篇关于楚辞的著作，辑佚了26种元代以前的《楚辞》著述，考证了51篇古人模仿《离骚》的著作，整理了20幅古代有关屈原和《楚辞》的书画，以及27种外译本《楚辞》。^②

在研究过程中，饶宗颐有清晰的目录学思维，他说：“从目录学得到一个纵观全局的眼力，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进行贯通，这样做的治学领域才能广阔。”^③有目录学思维在横向上不会单纯局限在某一领域、某一学科，可以窥见不同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的长处；在纵向延展上也不会局限在一朝一代，会有一种宏观的历史视角。他的目录学的视角体现在一种旁通能力，即“开发式目录学”由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由一个文献系统到另一个文献系统。^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读书须贯通，做学问也须贯通。……看似毫无关联的问题集中一

①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第77页。

② 参见郝润华“饶宗颐先生的目录学成就”，贾益民、李焯芬主编《第一届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第20—21页。

③ 饶宗颐、陈韩曦：《选堂清谈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④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第78页。

起，进行探究。”^①纵观饶宗颐的古史学研究，正是因为有目录学知识的支撑，他总能发现前辈学者未发现的问题，查找到一些别人未曾留意的史料，发现一些表面看来毫无关系的材料间内在的关联。他的“开发式目录学”不仅适用于目录学研究，也是做学问的指南。这种关联饶宗颐也曾从学理上予以阐释，他说：“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要文史不分家，其实是要文史哲艺统统不分家。”^②饶先生生前更喜欢别人称其为文化学者而不愿意被称为专家。他所说的这种文史哲艺不分家，与其说是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不如说他认为中华文化内涵的广泛与各个领域来源的一致性。

（二）训诂学的研究方法

训诂学的方法是做传统学问离不开的方法，作为国学大师的饶先生对此方法游刃有余，自然而然地融入其学术研究当中。训诂学一般被划分在语言学这一学科里面，传统的语言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其所研究的侧重点是形体、语音和语义。^③训诂学的方法又分为声训、形训和义训。在古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对文字的考据上，既运用了声训，也运用了形训和义训。

饶宗颐先生所受训诂学的“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孙诒让和顾炎武的影响。饶宗颐提到他做学问所追求的“精”就是来自清代的朴学。受其父饶锷先生的影响，他少年时就对清儒有很大兴趣，他非常赞赏孙诒让治学严谨和顾炎武探究原委的学风。^④二是受清末历史地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晚清巨子沈曾植的影响。沈曾植是清末重

① 施议对、施志咏编纂：《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7页。

② 郑炜明：“论饶宗颐先生的华学观”，《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十周年馆庆同人论文集饶学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

③ 参见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④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2000年，第77页。

要的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同时在书法、绘画、佛学等方面造诣颇深。沈氏对饶宗颐的影响体现在“三元说”、西域南海史地研究、梵学研究等方面。^①三是受日本学者扎实的学风影响。饶宗颐曾经多次东渡日本，或参加学术会议，或查阅甲骨文等资料，与池田温、渡边隆男、青山杉雨、今井凌雪、西川宁等日本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学术风格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饶宗颐特别赞赏日本学者抓小题目的学术方法，学者间逐字探讨的学术风气。^②这种学术风格也影响到饶宗颐的学术研究，其成果大多就小问题展开分析论述的小文章，较少进行大的学术史梳理和建构。

饶宗颐的训诂学方法在甲骨学中则更为广泛，如《通考》前论中即对《周礼》作龟之八命“象、与、谋、果、至”等文字进行了训诂。“象”训为观象云物，察应寒温；“谋”训为谋事、谋议；“果”训为“允”或“克”；“至”训为“来”。^③贞卜人物事辑对每个卜人都做了训诂，如卜人“争”契文作，亘字作，为邦名，又称“亘方”，等等。在训诂之外饶宗颐还运用校勘学的方法，“读契之事，校勘为先。综其大要，约有两端：一曰原物对堪，二曰同辞互勘”^④。可见训诂学、校勘学方法在《通考》中是一以贯之的，也体现了训诂学方法对文字考证、地名、人名等的重要性。

结 语

以五重证据法、文化互鉴的方法、古史重建的方法和文献学等方法为代表的国学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理解饶学的一种思路。从三重证据法发展到五重证据法，可以看出饶先生国学研究的方法论

① 姜伯勤：《饶学十论》，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第194—196页。

② 参见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第77页。

③ 参见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2009年，第43页。

④ 同上书，第19页。

逐渐走向成熟。他以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将文献的主次关系做了区分，同时也对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做了区分，并注意到了民俗学和异邦资料。他所认为的古史的重建是以考古学为基础，使传统文化的古义与现代化相融合，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通过饶先生以文化互鉴的方法来论证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印度、古巴比伦之间的互鉴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比较，进而从一种世界文明的高度看文化互鉴。目录学的方法是其学问的根基也是其学问发散的关键，是寻找文献材料的基础，也是扩展学术视野和增强问题视域之间的融合的途径。训诂学是学问枝繁叶茂的地基，体现了饶先生对国学研究“照着讲”的阐释方法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